

古韵心声

古韵心声

GU YUN XIN SHENG

安正仁 著

集中“古风”洋洋近千句，如江河奔泻万里澎湃，
鸿篇巨制大气磅礴，古今罕有其匹；“歌行”
咏叹动辄数百千言，顿挫抑扬脍炙人口；
至于众多律绝，则如玉盘盛明珠，宝匣储奇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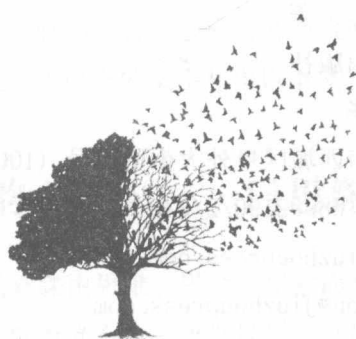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古韵心声

GU YUN XIN SHENG

安正仁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韵心声 / 安正仁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08-2593-4

I. ①古… II. ①安…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13573号

古韵心声

作 者 安正仁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6
字 数 228千字
版 次 2014年0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0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93-4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方寸净土 古韵心声

——读安正仁先生诗集有感

康怀远¹

几个月前，友人着我为《古韵心声》写序，于是一部诗稿便从古城长安凌空飞来长江之滨，储存在我的文档里。我几乎每天打开电脑，展读良久，却一直未能动笔，若说手上诸事多多，无暇顾及，难免有推脱之嫌。等我抽空再细读品尝，那发自安正仁先生的丹田之气、肺腑之言、心底之音，直使我按捺不住想说、想写、想感的丝丝灵动，于是就有了以下的文字和由以下文字组成的隙孔之见。

《古韵心声》，一日思深

“心之官则思”，诗尤其青睐由思维、思考、思索而激发的思想。用文字思想，那是生命撞击生活或命运的电光石火，璀璨灿烂，亮色有加。思想既是诗的魂灵也是诗的力量。这力量犹如生命的盐分，无它则诗不称其为诗，无它则诗无骨力，而仅为白开水而已。记得余秋雨说过这么一句话：“只有当生命被逼迫至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只有不完美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艺术创造工程》扉页语）安正仁先生阅历丰富，经历坎坷，饱受患难，是生活磨砺了他的生命，是生命给了他思想的翅膀，才方见其诗的魂灵之光。诗是心灵的歌唱，只有直接从心灵深处发生思想的诗才有价值，才令人掩卷不忘。70首“史鉴”诗和60首吟

1. 康怀远，老三届，生于三秦，长于三秦，读唐诗，爱李白。现为中国李白研究会理事，重庆三峡学院教授。

咏诗，从咏史、咏人、咏物、咏事、咏书着笔，在夹叙夹议中谈古“鉴”今、推陈出新，读者既可洞见作者独到的史论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能体味其中的思维广度、思考深度、思想高度。如《观史》写道：“仁者爱人真至论，泾清渭浊由此分。小白好食幼婴肉，易牙能烹亲子心。国君皮里唯兽性，佞臣腹中无人伦。千载休道齐桓事，独夫从来不为民。”历史上“蒸其首子”以“调和事公”的易牙，往往被标榜为忠君不二的良臣形象，但作者却从传统的评品窠臼中纵身一跃，另立新见，把带血的残忍撕破给人看，真可谓“鉴”明耳目，力透纸背。

遍览安正仁先生的“史鉴”“吟咏”作品，我隐隐地触摸到作者内心深处所蕴含的申明正义、道义和大义的文化人格力量。通常说“愤怒出诗人”，其实我倒认为“愤”而至于“懣”才是诗人创作的“触突”和“火山口”，愤“满”于“心”不能自禁，如“物不平则鸣”，好诗便喷涌出来，司马迁的“发愤”之说足可为证。《罪鞅讨秦歌并序》（古风）以七古长调 5000 多字的篇幅，表达“吾心愤然，乃作此歌以正视听”的历史评判，最后落实在“问罪商鞅今有我，更为烝民把秦讨”的主题意脉，充分展示了作者的诗胆、诗量、诗才、诗识。仿《陋室铭》的《蜗居颂》，调侃、洒脱，于无“愤然”中折射出平淡的不经意的“社会现实批判”意味，随遇而安的嬉笑幽默遂成佳品：“楼不在高，豁亮就行；宅不必豪，滋润就成。吾有蜗居，和谐温馨。凭轩花解语，卧帐鸟啭鸣。品茶翻闲书，把酒对高朋。弄孙喜做马，若还童。无宦海之烦忧，无名利之劳形。尘嚣不我侵，俯仰自从容。安子云：‘乐哉蜗居！’”滴水知海味，作者的其他诗歌也同样能以深刻的思想拨动读者的心弦，引起巨大共鸣。

《古韵心声》，二曰情饱

由 50 余首组成的“寄情”诗，多以登临、酬友、慰亲、随感、即时而发，兼或采用古词牌的形式出之，古色古香而不失时代感，把自己热爱生活的浓郁之情和对生活的深透把握和盘托出。诗无情不成诗，它是专事个性地洞悉世事人生、世态人情者的专利。诗人是人类文化的精神豪杰，所以鲁迅“无情未必真豪杰”的经典感悟就道出了诗歌创作的某些本质规律。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古论正可作如斯观，因为“感荡心灵”者，“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在《诗品序》）这就是“因情而造文”（刘



总语)所由生发的“诗者”“心之声”(金圣叹语)。这类诗歌在作者笔下——
一是意足。诗讲究立意。意者诗之帅也。无帅之诗,是用文字堆起来的散兵游勇,没有力度,没有骨气,没有棱角,通体泥软,像糖尿病患者。安正仁先生的诗作,气满意足,如《少陵别》:“担簦一拜赴帝京,严君抚肩频叮咛。少陵原头秋风劲,老凤苍凉雏凤清。”写作者在那个特殊年月考上大学时,背着父亲从古旧市场买的被子去学校报名和父亲临别叮嘱的情景,使读者可以情不自禁饱含热泪吟唱起刘和刚唱红全国的《父亲》和《母亲》这两首歌。立意之妙,于斯乎见。

二是神似。中国经典文论所强调的神气、神韵、神意都含有神似的诗学特征,它就是要诗人面对自然之景,离形取神,达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高远艺术境界和特殊生命体验,即《易传》早就提出的“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以及为庄子所发挥的“得意而妄言”的诗学思维魅力。这种诗学思维魅力无疑是具有东方特色的。从以天观物到由心及诗,在处理形、象、意的关系的时候,总是把传神和写意当做诗美的最佳旨趣,其心理通道与古希腊的模仿诗学思维大相径庭。《望故人居》:“碧影婆娑映苍苔,斜晖脉脉窗未开。小楼一统成追忆,顾盼依稀卧云来。”作者过友人故居,于楼下“驻足望之,心怅怅焉”的瞬间感念,写故居而不着意故居,写友情却不着意友情,反而给读者以情满意足的默契感。

三是语精。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也是抒情的内家功夫。思想的高度决定语言的高度,语言的精度决定抒情的浓度。诗的语言要求紧缩、精练,容量很大,著一字而尽得风流。《渔家傲·秋思》写于异地他乡,读着它,浓浓的故乡情结和孝心感应灵犀相通,叫人不可卒读:“秋风秋雨秋无际,黄叶黄花黄草地。雁阵惊寒声凄厉,衡阳去,长安家书托谁寄?梦中几回返故里,炕头围坐众姊弟。慈母泪眼绽笑意,天伦趣,恨煞窗外芭蕉雨!”

《古韵心声》,三曰格高

唐代王昌龄的《诗格》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诗有三不:一曰不深则不精,二曰不奇则不新,三曰不正则不雅;诗有三宗旨:一曰立意,二曰有以,三曰兴寄;诗有

五趣向：一曰高格，二曰古雅，三曰闲逸，四曰幽深，五曰神仙；诗有五用例：一曰用字，二曰用形，三曰用气，四曰用势，五曰用神，等等。安正仁先生的创作，倒不一定完全符合唐人诗格的严密规定，但其格之高却也毫不逊色，50首山水诗可以当之。

作者笔触所至，《大观楼》《西山睡美人》《石林》《燕子洞》《筇竹寺》《杜公祠》《曲江公园》《终南山》《太白山》《故乡引镇》《丽江拉市海》《海南行》《天涯》《海角》《亚龙湾》《椰林》《铜鼓岭》《万泉河》《小河》《清溪》等等，祖国名山胜水在所必览，览之必写，写之必有一种高格，那就是对美妙大自然的一往情深。我明显地感到他把热爱自然、亲和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精神融入诗歌创作。老庄天道自然观所赋予的对主体生命的领悟，被作者化作一种大彻大悟的自我觉醒，在由自我支配的精神天地里，畅游山水，通过回归自然和拥抱自然来过滤自己的灵魂。他所展现自然美景，统统具有了“天人合一”、“物我融和”、“小宇宙打通大宇宙”的聪颖和顿悟，是主体心灵与客体宇宙的和谐对话。他从天道自然观出发，进行着对天人关系的探踪寻访、悠远思考和深层追问，强烈的时空意识完全觉解于对宇宙和人生的哲学体悟，心灵和谐对应于大千世界，从而使得他有关山水的生命咏唱更具有了生态学意蕴。细心的读者自会琢磨其中格高之趣。至于“白玉兰”、“迎春花”、“牡丹”、“槐花”、“石榴”、“塘荷”、“牵牛花”、“桂花”、“梅花”、“雪花”、“瑞雪”等诸多生命个体，作者都给以特别的尊重、呵护、赞美，无不寄托自己的情思。其用笔的格式、节奏、韵律、声调、语言配制均做到了色相俱宜、八音协畅、低昂互节、疏密有度，内在的和外在的构成因素天浑然成，整合把握，完全是自己的风格，这些都无须我赘言了。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如果没有翻出如来手掌的齐天大圣的本事，大可不必动手。很显然，鲁迅是在讲唐诗的丰富、饱和和难以企及。是的，唐诗确实是诗中的诗，诗峰上的巅峰。唐代的好诗产生唐代社会的肥壤沃土，任何时代都无法复制。那时唐人诗意地栖息在那片土壤上，后世莫可望其项背。诗的国度，几乎人人咏诗、写诗、爱诗，上至皇帝，下至走卒，甚至连拦路抢劫和鸡鸣狗盗之徒也以能得到好诗而放弃为非作歹、草菅人命。但是，谁要是真的囿于鲁迅先生的意见，那他肯定会在创作上望唐诗而生自卑之叹。这对于以生命之责任去舞文弄墨者，我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有鉴于此，所以我说安正仁先生是一位勇敢者，在人生的奋斗历程中，他用人文的气度和胆量去领略诗歌创作的精神愉悦，心甘寂寞，无暇世俗，保持着方寸的净土，享受着生活的诗化或诗化的生活，颇具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价值追求，大有“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的民族风格与庄严人格。我钦服他——一个古都诗城孕育的平民作者和诗人。

不过我还要告诉他，鲁迅先生的话毕竟没有错，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不断用唐诗来衡量、把脉自己的作品，包括诗的气象、内涵、意境、气韵、章法、律度、节仗等，力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诗是“万物之灵性”的最高体现，凭安正仁先生的悟性，我的这些节外生枝的话姑妄听之也就罢了。

这不叫序，是感言、感想，也有感谢在里面。因为我与安正仁先生未曾谋面，他如此相信我，这也是人世间少有的。

2012年7月

写于长江之滨明静书屋

古风新天地 长歌真春秋

——安正仁诗歌创作说略

东篱采菊¹

一

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记忆。诗歌，就是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之一。中国是名副其实的“诗之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作为中华文化精华之一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从有文字记载的《弹歌》滥觞，《诗经》《楚辞》以降，三千多年来，杰出诗人灿若繁星，优秀作品恒河沙数，风格和流派林立，百花竞放，各领风骚。涓涓细流，汇溪成江，长河滔滔，不舍昼夜，从未止歇，丰沛异常。而且由于诗歌在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中一直占有特殊和显著地位，诗歌成为古今文人的生命。诗人们用诗歌言志抒怀，持身厉行，交往酬赠，登临吊古，讽喻规谏，激浊扬清，兴观群怨，参造化之妙，立不朽之名。诗性精神，诗教传统，诗歌研究，贯穿古今，就连山川名胜也因之而平添风采神韵。炎黄子孙皆为此而倍感骄傲荣光。

然而，上世纪肇始，几位国学泰斗、新文化的旗手、世界级文豪将如上共识颠覆，使人们陷入困惑和迷茫。先有王国维于1913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后有胡适于1917年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进一步说道：“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于是，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便为

1. 东篱采菊，为西安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

许多人所信奉。时人章炳麟说得更为绝对，他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云：“唐以后诗，但以参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语则不足道。”鲁迅在1934年《致杨霁云》中也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佛掌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照几位大师所说，何止唐以后无诗，唐以前也无诗了；齐天大圣本是虚构形象，中国人谁还敢动手写诗呢？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仅唐有诗。如此，中国源远流长的“诗之国度”岂非妄说，不但是名实不符，简直是自吹自擂的瞎说。

不容置疑，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不全谬。另几位大师之论，也确实有一定道理。他们的致命之处在于不仅失之偏颇，而且简直走向了绝对。照他们所说，将置《诗经》《楚辞》于何地？他们也可能忽略了，宋代诗之盛况并不亚于唐代。有人说仅其总量就是唐代的五倍。更何况，宋代的著名词家，诸如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在当时是以诗作驰名于世的。而后的元明清著名诗人亦不可胜数。近现代诗歌的成就也不可小觑，更不容抹杀。胡适先生说“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乃文明进化之公理”，确有道理。那么，唐人写的反映唐生活的诗是诗，而其他时代的诗人写作的反映他们时代的诗，就不能叫做诗吗？鲁迅先生的“好诗已经做完”，后人“大可不必动手”，看来说得太过头了。几位大师所持之论的弊端与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不仅造成唐以后无诗，宋以后无词，元以后无曲；更造成诗只属于唐，词只属于宋，曲只属于元；从而将中国的诗性精神，与社会发展、文化生活、文明传承隔离阻断。

唐诗宋词元曲，固然是我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与高峰，但绝不是“一览众山小”的“绝顶”，更不会“别无分店”的“独秀峰”，尤其不应是“戛然而止”的文化“绝响”。因为，关于诗歌创作，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得很清楚：“或有问于予曰，诗何为而作也？予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所以作也。”宋代的郑樵《通志·总序》说：“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元代许有壬针对“唐后虽有诗，终不如唐”的“唐诗迷信”驳斥道：“予谓：诗发于人心，天地无穷，人心无穷，不当以世代计也。”

因此，只要人类的社会生活存在，诗歌的生命力就不会衰竭，在“诗之国度”的中国更是如此。谁也否认不了，诗歌“流淌”在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血液中。



唐人功绩在于光大前人传统，铸就诗的辉煌，更在于“导夫先路”，使唐以后迄今的历代诗歌各有面目，各有成就。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诗不单属于唐，诗歌国度的诗性精神仍振藻于当下。纵观今人安正仁先生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赏读其长篇歌行体史论巨制《罪鞅讨秦歌》，我们对此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和高度认同。

二

我所熟知，安正仁深受家学的熏陶，自幼酷爱读书，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读书非常广泛，古今中外、公开出版、内部参考甚至封杀查禁的，只要是有用，能够得到的，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现在虽然鬓染秋霜，却仍然手不释卷，或浏览默读，或长吟高诵，含英咀华，累月经年，乐不知疲。他大学读的虽是历史专业，但在长期的大专院校教学中，他在讲授历史课程的同时，还长期兼授大学语文。博闻强识是他的突出特点，诸多名篇佳作，他都烂熟于心，能够为解一字而列举数句，也常援一句而吟诵全篇，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我更知道，在读书中，他尤其喜欢诗歌。歌德的，海涅的，拜伦的，雪莱的，普希金的，莱蒙托夫的，泰戈尔的……他都广泛阅读。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我国的古典诗歌。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诗等古体诗，从唐代的近体格律诗、歌行诗到宋诗宋词、元明清以及近代诗，在那山叠海涌的锦绣华章之中，他徜徉、跋涉、攀登，自得其乐，流连忘返。那琳琅满目璀璨辉煌诗作独具的节奏韵律、奇妙的情调意境和充盈的个性精神，使他如痴如醉，深受濡养。王摩诘之哲思禅趣，李太白之飘逸雄放，杜少陵之沉郁顿挫，韩退之之峭拔冷峻，白香山之晓畅深切，李义山之沈婉绮丽，苏东坡之豪放磅礴，李易安之哀婉凄切等等，都对他的诗性精神的形成和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诗书涵养了安正仁的性情，升华了他的人格，赋予了他力量，激扬起他的才华，触发着他诗歌创作的灵感。在创作中，他完全认同白居易写诗“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的诗歌观点；更高度赞同其“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他一如既往地坚持“写诗都不做无病之呻吟，不到痛极而哭，喜极而泣，乐极而狂，绝不动笔”。（《墨剑集·后记》）

纵观安正仁的诗歌创作，大凡社会的、人生的、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人文的、清醒的、梦幻的，都是他的吟咏对象、胸臆载体；山川河流、花草树木、

云雾雨雪、飞禽走兽、逸闻趣事、游历饮宴，都在他的诗笔下别具新象，理趣盎然。比如他的山水诗，把热爱自然、亲和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精神融注其中，在大彻大悟的自我觉醒里，在自我支配的精神天地里，畅游山水，拥抱自然，过滤灵魂。又如他的寄情诗（包括词作），写登临、写酬友、写慰亲、写随感，即时而发，似信手拈来，却独出机杼，且妙趣天成，古色古香而不失时代感，把热爱生活的浓郁之情和对生活的深透把握跃然纸上。至于他的史鉴诗和吟咏诗，则数量最多，情感丰沛。咏史、咏人、咏物、咏事，在夹叙夹议中谈古“鉴”今、推陈出新，使人既可洞见独到的史论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又能体味其中的思维广度、思考深度、思想高度，触摸到作者申明正义、道义和大义的文化人格力量。

著名作家、评论家张孔明在谈到他的诗词时说：“安正仁不是诗人，安正仁是唐诗宋词的传人。读他的诗，唐风扑面而来；读他的词，宋韵不减一分。他是得了唐诗宋词的真传，而觉悟了吟诗唱词的法门。性情在诗词里张扬放纵，却又被诗词吸收化合；诗词一任才华施展拿捏，却又被才华化蛹为蝶。这样的诗词无愧于一个字：美！”（张孔明《墨剑集·序》）正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真有字字如“握灵蛇之珠”而篇篇似“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之感。

安正仁的诗歌创作，在形式上不拘一格，只要适合于、有利于自己情感的抒发，意趣的表达，他都运用得炉火纯青。他的诗作或四言，或五言，或七言，或杂言；有古体，有近体，有歌行体，有长短句，都是他激情喷薄的好形式，才情洋溢的好载体。然而他自己却说：“我最喜欢用歌行体抒发情怀。”明代文学家徐师曾在《诗体明辨》中对“歌”、“行”及“歌行”作了如下解释：“放情长言，杂而无方者曰歌；步骤驰骋，疏而不滞者曰行；兼之者曰歌行。”从安正仁的歌行体诗作看，他是深得其中三昧的，写作起来得心应手，行行妙句，排列珠玑；篇篇佳作，蔚为大观。其诸多短小篇什，俊采星驰，美轮美奂；而其长篇力作，有的委曲婉转，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沉郁悲怆，都突显着“丰赡以多姿”（三国·魏·嵇康《琴赋》）的无限张力。比如《兰菊吟》，状写春兰秋菊，抒发品志抱负，宣泄胸中块垒；《登大观楼》则凭栏纵目，感怀际遇，幽愤血泪，怆然难遏。又如《歌赠仰紫斋主朱公庚逊六百三十字》，既是写给“品端才高堪师表”挚友的赞美诗，又是对其“骅骝蜷足困槽枥”的不平之鸣，也是对“灵犀遥接神早通，玉壶冰心对良朋”的友谊的歌唱；《丹青赞奉赠仙潭游子兼贺花甲》，洋

洋洋洒洒近 200 句，淋漓尽致的铺陈，绘声绘色的传写，是给予仙谭游子丹青圣手陈爱萍的画作评赞和从艺诗史。再如《幽怨歌·吊杨贵妃墓》，笔锋直指“失政误国无担待，却将万恶委奴身”的统治者和糊涂文人，替蒙冤者发出了“千载幽愤凭谁诉，倩谁史笔洗垢尘？”的悲怆呼喊；《调老天》则痛陈历史，特别是清末百多年来民族之苦难，哀亿万百姓运命之多舛。有怨有愤，有悲有悯，字里行间透出对历史的拷问，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赞颂。至若《春行》，则是诗人用激情四射的感情唱出的春的妙曲，通篇都洋溢着诗人追求个性自由，热爱自然、超尘脱俗、旷达飘逸的磊落情愫。《长安行》踵武“三吏”、“三别”和《兵车行》之神韵，《登太白山梦天》《登火山口》更深得李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之法门。

他的诗或有我之境，或无我之境。有我之境者，以我观物，物尽着我之色彩，《燕子洞》《山村春晓》是也；无我之境者，以物观物，物我浑一，《白玉兰》《迎春花》《石榴》《塘荷》是也。无论前者后者，皆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

如果说深厚扎实的国学修养，使安正仁站在了人格精神的“青藏高原”，那么，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成就，就是这高原上奇峰林立的巴彦喀拉山、巍巍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而今年春天他用不足半月时间创作的《罪鞅讨秦歌》，则是无限风光的珠穆朗玛峰。

三

安正仁学识渊博，长于表达，善于演讲。我们经常一起谈诗论文，指点激扬，听他的美谈宏论，读他的诗作文章。他也曾要我为他的诗作写点文字。今年春节过后，好几天不见他的消息。电话询问，才知他正处于酝酿许久的长篇史论诗歌创作的亢奋之中。正如清人纳兰性德《与韩元少书》形容钱牧斋那样，他果然是“腹笥既富，文笔又长，援古证今，每发一端，便如瓶水泻地，迸注分流”。旬日甫过，我便读到了他的长篇政论叙事长诗《罪鞅讨秦歌》。捧着那尚有打印机余热，散发着油墨香气的诗稿，我时而默看轻读，时而高声朗诵，时而前后比照，时而咂摸品味。浩浩荡荡六百七十二行，洋洋洒洒五千三百余言，我的血液因诗思而沸腾，我的心绪随情韵而昂藏。不忍掩卷，不忍释手。深受激荡，感慨良多。古人有云：“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我岂可以妄加评论，使佳作减晖，且误导他人。但又深为作者的诗胆、诗量、诗才、诗识、诗情所震撼，所感召，难以自己，便欣然毅然兼惴然地援笔论淑媛，

放手议断割。笼而统之，要而言之，我以为如下三端，最为突出。

一曰：情感炽烈，主旨宏深。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罪鞅讨秦歌》通篇充沛着的情，既不是一己之情，也不是儿女私情，而是“铁肩担道义”的大公至正之情。

一是难以遏制的问罪商鞅，声讨秦始皇的愤懑之情。作者是学历史、教历史的，从中国史、世界史，尤其是比照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史，丝毫看不出专制暴虐独裁的秦始皇的伟大，更产生不了敬佩热爱之情；而对申不害、韩非子，特别是商鞅等玩弄阴谋权术的法家思想，乃至从秦至清的皇权专制社会，没有一点好感。

二是悲悯历朝历代受尽残贼凌辱的黎民百姓的恻隐之情。“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无论朝代怎样更替，无论社会是治是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心系生民，为其号呼，引发同情，哀其不幸，冀其觉醒。

三是对于混淆视听跟风颂扬商鞅秦皇时弊的深深忧虑之情。从小学到大学，几乎所有历史教科书，皆盛赞商鞅，颂扬秦皇，把他们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功臣进行讴歌，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倍加推崇，把对他们的态度作为评判今人的重要的政治标准。在中国倡建民主，改革开放，要以崭新之面貌走向世界时，怀商鞅者多、美始皇者众，什么“今人未可非商鞅”，什么“劝君莫骂秦始皇”，时有鸦鸣鹊噪，惑乱人心。

四是挺身而出振臂高呼“舍我其谁”“壮怀激烈”的慷慨之情。作者创作本诗，除表达愤然、惘然、忧然之情外，更为了追踪溯源，指斥谬误，拨乱反正，以正视听。全诗贯穿着“天下兴亡，我的责任”，“问罪商鞅今有我，更为蒸民把秦讨”的主题意脉，表现出诗人历史的清醒、历史的良知和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历史自觉。可谓宏大至极，深刻至极。

二曰：鸿篇巨制，气势恢宏。

清代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沈德潜有云：“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如太空之中，不着一点；如星宿之海，万泉涌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动，万物发生。”（《说诗碎语·卷上·六》）又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为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羈，飞迁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说诗碎语·卷下·三》）我觉得，这些话用以指安正仁的为人及创作，也极为切当。他虽系书生，教书授徒，草根作家，但心忧天下，秉



笔直书，舍我其谁，这就是第一等襟怀抱负。施展第一等学识，写出第一等好诗应是情理中的事。

就篇章规模和内容而言，《罪鞅讨秦歌》全诗，共计7章，14800余字。其中：序，550余字；诗作，672行，5400余字；注，102条，8900字。较之白香山的《琵琶行》88行、《长恨歌》120行和屈原的《离骚》374行，可见其规模体制之宏大。诗作内容囊括自周至今血雨腥风的数千年历史，纵横千万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文赋》）其中朝代更替，战祸频仍，虎噬狼吞，“山河破碎风飘絮”；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身世浮沉雨打萍”；污吏横行，宫廷恶斗，“城头变幻大王旗”；人物众多，事件复杂，叙事状物，绘形摩声，读之令人击节动容，思之如醍醐灌顶。较之他人之作，或写一花一木，或写一山一江，充其量数十字概写北国，其时空视角空前广阔。如此丰富内容，均非主观臆想，凭空虚构；也非文学笔法，联想夸张；更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全有史籍可考，实据可证；史料翔实，博引旁征，很好地实现了他“正本清源涤尘垢”的创作初衷。

就诗作格调特色而言，正所谓“愤怒出诗人”。诗人喷射满腔怒火，挥动如椽巨笔，调遣“千军万马”，擂起激越战鼓，问罪高鞅，讨伐秦皇。其声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长江洪峰涌三峡，浩浩汤汤，汹涌澎湃，竅坎铿锵，排山倒海，气势贯长虹，威烈撼天庭。他的诗笔又如斩妖劈魔的干将莫邪、龙泉巨阙，《商君书》所包藏的残民愚民之祸心、之歹毒，昭然若揭，凶相毕露；秦始皇专制暴政之罪孽、之流毒，丑态全出，恶果腐臭。什么法家先驱，什么千古一帝，剥去伪装，扒下装饰，原来全是惑人鬼魅，吮血蛇蝎，嚼骨豺狼。这样的诗歌讨伐，又如指挥堂堂之师，高举正正之旗，猛追穷寇，直捣黄龙，上顺天理，下合民意，痛快淋漓，酣畅至极。欣赏这样的诗歌真是享受精神饕餮，思想盛宴，快哉快哉！快哉快哉！

三曰：架构精巧，匠心独运。

如此主旨宏深的鸿篇巨制，也考验着诗人的驾驭之力和经营技巧。安正仁艺高胆大，“不但不随世人脚跟，亦不随古人脚跟。”因为“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随我之所能而发宣之，必有克肖自然者，为至文以立极”。（叶燮《原诗·内篇·下》）不随人脚跟，并非妄自尊大，不要学习借鉴。恰恰相反，我们看出，安正仁是极善于学习借鉴的。贾谊的《过秦论·上篇》开篇以大量篇幅对秦昔日“振长策而御宇内”、“席卷天下”、“囊括四海”强大的历史进行铺陈，衬托它一旦败于



氓隶之手的狼狈惨相，指出其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仁义不施。”杜牧的《阿房宫赋》则铺采摘文，状写阿房宫兴建的壮丽辉煌，揭露秦朝统治者的穷奢极欲，毁灭的惨相，“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告诫统治者要“各爱其人”、“哀之”“鉴之”。安正仁的《罪鞅讨秦歌》充分运用大量铺陈史实的手法，突出商鞅和秦始皇的罪恶，与贾杜之作可类。但是本质区别在于，贾杜二人是帮助统治者总结教训，以便其稳定政权，进行讽喻规谏；而安正仁的呼喊则完全是为民申冤，为民讨贼，吊民而伐罪。

当然，不随人脚跟，更强调要因内容需要而大胆创新。出于《罪鞅讨秦歌》的特殊内容，诗人在每章之后都附有必要的注释。诗歌与注释紧密结合，诗歌为主，注释为辅，注释为诗歌服务。因为《商君书》在文字上“佶屈聱牙”，非常艰涩，难以卒读。要揭露《商君书》及各代统治者残民愚民之罪恶，不因其书，不援史实，显然不客观，不科学，所以引用原文，在所难免。辅以注释，既便于读者理解诗作内容，又以大量史料示以读者。商鞅之罪，秦皇之恶，证据确凿，罄竹难书，难以推脱。可以说，诗释结合，是作者的一大创举，亦是一大特色。

诗作的又一大特色，是以叙事诗的语言铺陈大量史实作为论据，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罪鞅讨秦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是历史、政论与诗歌的巧妙结合。因为他的诗作资料直接来自于历史典籍，而非二传手三传手乃至不知几传手的转抄，最为接近真相；而且是站在百姓民生的角度，并非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政权，而探求原因，总结教训。要说“春秋”笔法，这才是真正的“春秋”笔法。

《罪鞅讨秦歌》在艺术上的超绝之处是多方面的。其一，虽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但篇章结构谨严。一方面是按历史顺序，从周秦汉唐元明清，直至近代，线索清晰，不枝不蔓。二方面是根据历史真相，篇章长短变化，不板不滞。历史的真实赋予了诗作节奏变化，黄河九曲，跌宕起伏。有急管繁弦，有低昂婉转。所用句式，绝大部分为七言，甚为整饬，但又决不拘泥，只要内容情感需要，或两三字，五六字，甚至十几字，长短句杂陈，充满灵动与张力。三方面是章节之间有领起，有承接，有伏笔，有呼应，衔接自然，卯正榫坚。其二，诗篇虽长，他在用韵方面也非常讲究，恪守诗歌用韵要求，灵活自然。有的篇章较短，就一韵到底；有的篇章甚长，则及时换韵，避免声嘶力竭，力争变化自然。其三，诗作想象丰富，语言准确，“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苏轼）叙写状摩，形象生动。该文雅时，雅得到位；该通俗时，俗得天然，转闪腾挪，不拘一格，

恰到好处。娴熟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或排比铺陈，或夸张凸显，或连类比喻，或对比映衬，或用事设典，或对偶顶真。天机云锦，妙语连珠，佳句层出，不胜枚举。

读其诗，激烈处如饮甘醇，让人热血沸腾；平和处如品香茗，意味幽远绵长。含英咀华，唇齿留香。使人们在诗意的享受中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

他拓展了古风新的天地，谱写了长歌不朽的“春秋”。

还是叶燮说得透彻：“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欠，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荒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人，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我以为，安正仁正是这“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的当今诗人。

2012年9月5日

于菁华名门

